

混沌的现代性

目 录

现状、问题与趋势：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代前言)	1
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27
混沌的现代性	
——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分析	33
现代性与近代性的多元对抗	
——论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轨迹	48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	
——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66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都市文学	80
文化散文：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	94
现代小说文体与“想象的共同体”	101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	
——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115
“莎乐美之吻”：作为形上存在的石评梅	121
胡风启蒙文学观新论	136
莫言的欲望叙事及其他	151
“伪民间”与反启蒙	178
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恋主义思潮	185

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原创性

——关于当代文化理论建构的一点思考	217
文本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新构想	229
从胡风悲剧看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与人格自塑	238
当代作家宜“评”不宜“传”	253
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科学观念	259
文化认同与江苏小说的审美选择	270
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	279
答“新启蒙论坛”大戈先生十问(代跋)	286

总 序

董 健

我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鸡鸣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我们又出版第二辑共十种。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为什么这么说呢?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三江之后是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始)、南京高师(1915年始),再接下来就是东南大学(1921年始)、国立中央大学(1927年始)、南京大学

(1949年始),悠悠百年,延绵不断,这座鸡鸣山就是学术高地的象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也与中央大学为邻,紧靠在鸡鸣山的怀抱里。即使是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最腐败不堪的年头,大学和研究院这样的学术和精神的高地也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整个社会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清流,抗拒着滚滚而来的社会浊浪。1948年鸡鸣山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作为一个体制化行为而高度体现了政治上的宽容与学术上的自由,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颇为乐道的一段佳话。当时选出的院士,人文组二十八人个个都是学界巨子,即使在政治上为当局所不满的左翼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之辈,亦名列其中,而有些颇得官方赏识的学者却名落孙山。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的权威由是而立。显然,建立学术高地,不仅要严防社会腐败之风(目前此风正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对学术界的侵袭,而且要时时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对此,我们有颇多的感慨与期待,同时也是怀有信心的。

其次,看中“鸡鸣”这个名字,还因为鸡鸣山上有座鸡鸣寺,鸡鸣寺里有座豁蒙楼。古寺的晨钟暮鼓,往高处讲,自然可以引出一些有关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话题,这里且不去说它。单是这豁蒙楼,就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颇有些警戒的意义。豁蒙之义与启蒙相通。中国人吃尽了受蒙蔽之苦,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说“五四”启蒙早已过时。然而看看近十多年的文学界吧,譬如,不久前我还看到一位法学家竟然出面捍卫“样板戏”里的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这种种怪现状不都在说明着未经启蒙的精神蒙昧吗?我们的文学研究难道对此能漠然视之吗?

豁蒙楼是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两年之后,也就是戊戌

变法失败六年之后，为纪念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修建的。杨锐为政治改革触怒专制主义而掉了脑袋。张之洞重游鸡鸣寺，忆起甲午中日战起之年与杨锐同登此寺置酒畅谈、纵论古今，为国势陆危而痛叹的情景，似乎对当年学生吟咏杜甫“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的诗句又生出了一层系于现实的解读，遂倡议起楼，并亲笔题“豁蒙楼”匾额。看来，一切有点求新、求变头脑的人都有一种反蒙蔽的焦灼感。豁蒙者，解蔽也。看清了遮盖、蒙蔽之物而将其揭去，叫人心明眼亮起来。这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譬如在鸡鸣寺建此楼之时，为了登楼远望，一览湖光山色，张之洞要求尽伐近边的丛木，这就是给自然景观除去了遮蔽。精神上的豁蒙当然是更加困难的。中国古人讲“正心”、“明道”、“解惑”、“劝学”、“致良知”等等，多少也有些精神豁蒙的意思在，但在那个专制主义文化的大框架之内，所谓豁蒙往往转来转去又变成了新的蒙蔽。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就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吧，我们至今还记得，人一犯错误就检讨说受了蒙蔽，然后被“代表正确”的人教导一番，“心明眼亮”地去“战斗”，但不久就又有新一轮的“正确者”来宣布你再一次受了蒙蔽。清华大学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何以至此？等到“文革”噩梦一醒，才知道当时全民都处在一个精神蒙昧的时代。

真正的思想精神上的豁蒙，现在叫启蒙(enlightenment)，这是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才开始的事。在中国，五四启蒙打开了人的思想、精神的新境界，是人与文学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是，老的“左派”说，启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已被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所取代，现在再讲启蒙，就要“启”出反党的思想；“新左派”则说，启蒙是西方来的“殖民话语”(按：此言本身倒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殖民话语),要捍卫我民族独立性,应拒之国门之外。马克思主义只能吸纳、包容而不可能颠覆、取代启蒙主义。有些新派论者以“审美现代性”否定“资产阶级现代性”中的启蒙精神,也是很片面的。只要你承认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共同与共通之处,你就不能不看到现代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告别迷信盲从状态,做一个明理自觉、个性健全之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母、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凡此种种,中外先贤多有系统阐述,虽是老生常谈,至少在中国却并未过时。凡此种种,关乎民生、自由之制度建设,均为人类共同与共通的追求,早已超越了阶级与国度,没有什么你强加于我、我强加于你的问题。这里用得上孙中山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文学拒绝启蒙,便不出政治工具与庸人玩物两途,这当然是我辈同仁所高度警惕的。至今还有不少人将“启蒙”与“政治”混为一谈,将“去政治化”与“反启蒙”作为一件事。岂不知有些政治行为本身,如果它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它就必然是以蒙蔽人民为前提的。

在此,“鸡鸣”之称中的一个“鸣”字,至今仍不失其对文人学子的一种莫可名状的诱惑力。吾辈既为文人学子,便不可不思;思而有得,便不可不鸣;鸣而遇到不同之见或受权威压制,便不可不进而争、进而再鸣。如此往复无已,学术便得到发展。1957年“大鸣大放”虽然吃了苦,但人们至今难以忘怀那个短暂的学术春天所显示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气。最近十多年来,学术环境相对来说比以前是宽松得多了,“多元化”的口号也叫得颇为响亮,但总也形不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鸡零狗碎、庸俗不堪、充满广告味的“热点”(如文学界为所谓“名誉权”打官司之类)倒是不断出现,也

时有某某领域某某人有某某“新说”、某某“新论”的报道，但多为炒作，认真严肃的学术争鸣却是没有的。归根结底，这是学术界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的萎缩所致。简单化的、直线的“两元对立”(alternative)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话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为了冲破“鲁郭茅”的评价格局，便非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抬得更高不行。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叫人辨不清历史的真实色彩。很少有人从综合的文化效应上，从人与文学之现代化总趋势上，去研究鲁迅与胡适的共同价值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如鲁迅主张改造贾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张大“个性之尊”，呼唤“人国”之建立，胡适则鼓吹健康的“个人主义”，这在人的现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又如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再造，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胡适则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相通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一定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首先被丢弃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比如，现在讲“民族性”、“民族精神”很时髦，但很少有人从鲁迅、胡适已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揭示“民族性”、“民族精神”之反现代性的巨大负面影响。只顾顺着“国情”、“中国特色”去讲，所谓“中国化”就往往不是化向新、化向现代，而是化向旧、化向前现代、反现代，就像鲁迅所说的：“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深度争鸣的缺失，还因为我们往往在貌似“多元化”的众声喧哗中，找不准价值的定位。主张“多元化”，提倡学术上互相宽容与尊重，决不意味着无比较、无权衡、无轩轻、无选择。面对互相对立的思潮与倾向，不偏不倚而“执中”就行了吗？孟夫子说得很明白：“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讲的这个“权”字非常重要。权就是秤锤，没有它，你无以知轻重。所以孟子认为，没有权衡的“执中”仍

是片面的、偏于一端的“执一”。现在有些貌似很“公允”、很“折中”的理论，其实是很褊狭的。褊狭之风与浮躁心情有关。孟子在讲到无“权”之害时，举了个生动的比喻：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人，别看他吃喝得津津有味，但其实他是得不到“饮食之正”的，因为口腹的“饥渴之害”使他不暇掂量、选择，不能沉着、从容地做事。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后现代”的鼓吹者，有时就会露出这种“吃相”来。这样吃，就难免从垃圾里吃出“美味”——比如，从“文革”里品出“民主意识”，从“样板戏”里品出“后现代性”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既有价值定位又不定于一尊的深度争鸣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

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与研究，说到底就是苦心孤诣地把那么一点“思”、一些“感”用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言说”(discourse)。说什么？怎么说？这是言说水平的问题；向谁说？听谁说？这是言说对象的问题。心之所感有正邪，思之所得有深浅，言之所形有是非，这里边是大有讲究的。大抵古人早就感到了言说之难吧——晋朝有个叫宋处宗的人，家养一只会说人话的长鸣鸡。这位宋先生就是在与鸡的对谈当中“言功大进”，即大大提高了言说的水平。故而古人著书立说多称“鸡谈”、“鸡谭”云云。这个故事见于南朝宋刘义庆辑录的《幽明录》，那时的人看重言谈之功，才会编出这么一说。鸡当然是不可能说人话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人亟欲提高言说水平的迫切性，一方面也说明言说对象之难以到位的困惑与无奈。与其对牛弹琴，不如沉默与独语。与通人语的鸡对谈不是比与不通情理的人对谈更有益吗？我们的“鸡鸣丛书”当然面临着当代世界的言说之难。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听谁说？”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矩。这些概念和规矩，一直都在牢牢地统治着我们的头脑。如今，必须对它们

一一加以梳理和甄别,有些应该被质疑、被替代、被颠覆。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当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会在困难之中言说出新的水平来,这样,也就会逐渐建起学术的高地。

2007年6月22日改定

现状、问题与趋势：

现代性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代前言)

一 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背景及现状

在汉语学界，“现代性”这一提法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被偶尔使用过，但是当时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那时候它既不是作为概念被使用，更不是作为一种理论视角被提及。运用“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始发于海外学者，20 世纪 70 年代，历史学家柯文研究王韬时使用了“modernity”一词。李欧梵则最早有意识地将现代性理论系统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在 70 年代末参与编写《剑桥中华民国史》时便将 1895—1927 年的中国文学潮流定性为“追求现代性”。海外学者的这一研究动向在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响应，尤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大陆思想界各个领域普遍在寻找研究范式的转型之际，“现代性”问题迅速成为一大焦点问题，先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继之扩展至美学、文学研究领域。

不过在最初的“现代性热”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使用远远不到位，人们对现代性的内涵多从知识论上加以认识，而较少涉及思维方式的更新、现代性的过程以及现代性的内在张力等更重要的层面和问题，相对来说，这一局限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较之西方研究为甚，在文学现代性研究领域较之纯理论领域的美学现代

性或者文化现代性研究为甚。虽然汪晖的论文《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以及刘小枫专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在研究界影响甚巨，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并不能完全理解论者的理论意图，再加上研究者不同的价值立场与研究定势，文学现代性研究的热潮与其自身的莫衷一是、纷纭复杂相伴而生，乃至形成了现代性与近代性、后现代性之间的双重悖论。不少学者的中国现代性言说并非出自于对现代性问题本身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后现代性”的一个对应性概念，比如有学者提出“现代性的终结”论和“后现代性的到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种言说方式，即试图否认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仅仅呈现为一种“近代性”。研究界的这种巨大反差与悖谬说明，文学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一方面体现了研究者求新求异突破传统的思想冲动，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它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型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与传统的社会/文化批评、历史/美学批评不同，选择了它同时也就别无选择地进入了一种知识与思维、工具与价值多重更新的艰难之路。

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不断介绍和阐释的推进，以及随着杨春时、宋剑华文章《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引发的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热烈论争，文学现代性问题得到了日渐深入的探询。现代性从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到作为一种逻辑想象，再到作为一种阐释框架，为我们想象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进程不断提供着新的方式、新的角度和新的话语，它不但拓展了文学研究视阈，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使过去在文学史叙述过程中被忽略或被遮蔽的文学现象重新纳入文学史视野，改变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以及文学史的叙述模式。据笔者统

计,2005年至2006年,研究文学现代性及其关联比较密切的美学现代性的论文就有两百余篇,专著或论文集约十几种。^①《南京大学学报》、《江海学刊》、《东南学术》、《厦门大学学报》、《求实》等刊物都设有“现代性”或“现代性与文学”栏目。可见,文学现代性仍然是近两年方兴未艾的热点与前沿问题。就其前沿主题来看,文学现代性问题一方面直接推进了对近代以来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于现代文学文体生成及其特质的重新理解,另一方面又拓展出本土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现代性的空间性等新的话题,同时对于现代性自身以及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反思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入。

二 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前沿主题及其特征

（一）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角度对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重新进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集有——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旷新年《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宋剑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韩毓海《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逢增玉《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版；俞兆平《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耿传明《“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温奉桥编《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颐武编《现代性中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春时、俞兆平编《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行价值评判和文学史叙述,可以说是现代性视角为重写文学史提供的最突出成果之一。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是否体现出“现代性”?如果具有现代性,又是一种怎样的现代性?这一争论同时也牵涉到人们对“现代性”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价值评判问题。文革文学到底是现代性的延续还是现代性的中断,文革文学到底是不是现代性的写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李杨在其《抗争宿命之路》中基于共产主义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建构角度肯定毛泽东思想和1942—1976年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汪晖则以“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来概括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从而将左翼和十七年文学纳入现代性叙事的范畴。近两年,研究界对于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超越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之视角,伸向了现代性研究的多个层面。

第一种研究视角延续了上述观点,从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层面认证左翼、十七年、文革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如程光炜从个人与国家的矛盾中理解当代文学的双重品格;李杨认为“五四”的个人认同、晚清的民族国家认同乃至上个世纪30年代的阶级认同,这些现代性范畴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断裂;张志忠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文学所担当的对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认同,是种种现代性之所以能展开的必要前提,也就是从左翼文学到“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价值之所在。杨厚均认为新中国文学以其对新中国合法性论证与新的民族国家精神的建构而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并以此为角度阐释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上述论点主要来源于“民族国家”起源及诉求的现代性特征,从民族国家认同这一世俗现代性维度,肯定了“十七年”文学具有与启蒙现代性、审美

现代性等相辅相成的现代性追求。^①

第二种研究视角则从阶级视角出发，从关注现实、追求平等、同情贫苦人民等角度切入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这种研究视角主要从马克思关于阶级和平等的观点汲取现代性资源，侧重于社会现代性层面。如有学者认为左翼文学上承“五四”“为人生”的文学传统，自觉地探求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这种对左翼文学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资源的重新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市场经济背景下所引发的忽视平等、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回应。^②

第三种研究视角从文学之于现代性主体成长、生成及现代性的时间维度上肯定文革的现代性特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竭力开掘现代意义主体的生成过程。^③胡军《叙述“成长”——试论〈红旗谱〉叙事的现代性》^④从主人公主体生成的角度认证《红旗谱》的现代性及其建构。现代性主体的生成体现了一种对于现代性时间的把握，邵明《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⑤便从“现代性”的时间维度出发，探讨表现于“十七年”文学中的现代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后果。“主体”和“时间”都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不过研

① 分别见于程光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李杨《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张志忠《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载《文史哲》2006年第1期；杨厚均《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新中国文学》，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 曹林红《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现代性重读》，载《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④ 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⑤ 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2期。

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并非将它们作为肯定的概念,而是作为反思的框架来分析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特征。

第四种研究视角则侧重于从审美形式切入“十七年”和“文革”文学,试图发掘红色经典和样板戏的现代性审美特征。如赵树勤、杨贤美《“文革文学”与现代性》^①、杨经建《“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②等,不过这种单纯从新的美学特征的出现来发掘所谓的审美现代性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否定性质疑。^③

上述研究者对于现代性的概念理解不尽相同,切入文学研究的角度也各有侧重,有从现代性的建构的角度切入,有从后现代性的反思角度切入。不过总体而言,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摒弃了对“现代性”或一个时期文学简单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而是试图从多维度、多层面对于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进行全面反思。不过上述研究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研究者对于左翼、十七年、“文革”“现代性”的理解主要是侧重于世俗现代性的一维,而忽视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维度,导致对文学作出单一化理解的倾向。或者正如有些学者批评的是一种“历史混合主义”和“庸俗技术主义”的研究方法,忽视文本的具体历史情境,通过单纯的审美解剖认证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放弃研究者的价值立场。此外,上述研究者侧重于从主流文学出发,未能从文革的“地下文学”与主流文学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研究文学的整体特征,难免有片面化之嫌。

(二)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研究

上述关于左翼、十七年、文革文学思潮的现代性探讨是学界最

① 载《云梦学刊》2005年第3期。

② 载《东岳论丛》2006年第1期。

③ 黄云霞《样板戏之“现代性”质疑》,《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富有争议也最具有探索空间的话题。然而对一个阶段的文学指认离不开对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离不开对各个文学发展阶段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考察，因此，只有以历史的眼光和整体的眼光对20世纪文学思潮进行全盘考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严家炎、袁进《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杨春时《现代性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思潮》、尤西林《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的现代性嬗变》^①就具有这种整体性的眼光。上述文章有的侧重于从文学外部环境的变化，研究文学的历史现代性演变，有的从文学本体入手，从文学主题和创作方法等层面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特征，有的从中国现代性自身的特征和张力角度，透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嬗变的历史脉络和特性。如果说上述观点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解还侧重于个性主义论述与民族国家想象这两种主要论点的话，那么张均《我们怎样进入历史——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②则着力凸显普遍历史的建构这一重要的现代性叙事生成层面，并指出普遍历史的建构，使现代文学以叙事的方式参与了庄严的动员机制与拯救事业，从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核心秘密。这就为我们突破西方现代性的关于个人和民族的二元概念，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自身情景出发理解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途径。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对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研究存在着割裂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内在关联的倾向，在论述中往往采取单一视角，用一种现代性挤压另一种现代性，不免忽视

① 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② 载《东南学术》2006年第3期。